

震惊中的世界

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

视

透

光

曝

真

写

大

点

大

点

大

点

焦

热

光

曲折离奇的诉讼案件



跨越世纪的朋友

一册在手 拥有世界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德祿 卢淑 主编

《震惊中的世界

——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

曲折离奇的诉讼案件

汪 渊 智 等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晋新登字 6 号

折离奇的诉讼案件

汪渊智等

*

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书店经销 山西省人民印刷厂印刷

68 1/32 印张:5.25 字数 117 千字

1 版 1994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203-02753-8

G·1119 定价:3.60 元

卷 头 语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即将奔腾而去的二十世纪是一股气势磅礴、宏伟壮阔的洪流，近百年的千回百转、左奔右突，多少电闪雷鸣迸发、多少巨涛恶浪涌起、站在世纪洪流最后的入海口，回眸星转斗移，风卷云起，人们不能不为之震惊：这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世纪，这是一个多么变幻无穷的星球！

《震惊中的世界——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就是对二十世纪中震撼世界和人们灵魂的热点、焦点、闪光点的大透视、大曝光、大写真！

收在这套丛书里的各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性创作，它们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作为一套通俗而严肃的知识读物，期望能使读者获得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满足。

这套丛书也不可能对二十世纪的所有重大历史现象尽收笔下，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视野范围内所作的虽然力求准确生动而仍然难免疏漏讹错的粗疏的扫描。

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广泛地收集了资料并得益于这些资料，在此，对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所希望的是：对于曾经跋涉于二十世纪和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朋友，这套丛书为你留下回忆与思考，伴你走向明天与未来。

《丛书》编委会

1993年8月

目 录

卷头语

“被告”的反审判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 (1)

“七君子”之狱…………… (21)

“布哈林同志的血”

——苏联大清洗中头号冤案…………… (42)

田中角荣受审记

——洛克希德案揭秘…………… (61)

共和国“超级审判”

——江青在法庭上的“告别演出”…………… (79)

斩断黑手

——意大利黑手党大审判纪实…………… (96)

从“皇帝”到“阶下囚”…………… (113)

拳王沦为囚犯

——泰森强奸案内幕…………… (126)

暮年受审

——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受审前后…………… (146)

“被告”的反审判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6月18日出生在保加利亚拉多米尔县的科瓦切夫齐村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米哈伊洛夫是性格刚强的皮帽匠，母亲帕拉什凯娃是吃苦耐劳的家庭主妇。由于生活的重压，季米特洛夫只受了六年教育就不得不辍学为徒。从此，工人阶级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书籍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索非亚党组织的俱乐部（夜校）是他的“第二个家”，他经常到那里去聆听革命前辈们阐述的革命道理，在他们的熏陶下迅速成长起来，并积极地投身于保加利亚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中。

1902年，季米特洛夫光荣地加入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共产党的前身），1905年，他被选为索非亚党组书记和全国工会同盟书记。1906年，即他24岁时，他受命领导了震撼全国的佩尔尼克矿工大罢工，一举扬名。是年，他同塞尔维亚革命者柳芭·伊沃舍维奇结为夫妻，俩人携手并肩地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更艰

难的途程。

从1913年起，季米特洛夫由本党提名，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利用议会讲坛，竭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坚决反对掠夺性战争。到了1923年，由于保加利亚著名的九月起义遭到镇压，季米特洛夫被迫忍痛辞别故土，开始了漫长的侨居生涯。

1932—1933年，是德国革命高涨的时期，季米特洛夫受共产国际的指派，秘密地在德国指导工作，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西欧局负责人。

国会纵火

1933年1月30日，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将政权交给了希特勒，并在欧洲的中心——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走向军国主义的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当时就已经准备着新的世界大战的犯罪计划。借助于法西斯专政，德国法西斯独裁政权打算建立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残暴恐怖制度，并把其他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纠合在自己的周围，以便向苏维埃联盟及其他民主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德国军国主义决定仿效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所曾经做过的那样，从进攻劳动人民及其革命成果开始。这一计划是在反对“共产主义危险”的掩盖下进行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策划某种行动把仅次于纳粹党力量的共产党在世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扭曲，把他们污蔑成一群不仅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且反对民主制度的阴谋家。

1933年2月27日，柏林传开了国会纵火的新闻。希特勒来到火灾地点，在外国新闻记者们的面前公然发表谈话：“这是神的指

示，现在我们来打击共产党人吧。”

当天深夜，季米特洛夫搭乘晚班火车从慕尼黑前往柏林。他从晨报上知道焚烧国会大厦的消息。这些报纸在以大号字报道新闻的同时，断言大厦被烧是德国共产党的暴行。季米特洛夫立刻敏锐地觉察到，这是预谋的法西斯挑衅。

3月3日，季米特洛夫得知台尔曼（德共主席）被捕后的消息后，预感到在柏林从事地下活动的条件越来越困难了。3月9日，正当他忙于共产国际的扫尾工作，准备转移到别国去时，由于纳粹党徒、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他在“伯扬霍夫”饭店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两名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尔·塔内夫。

三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被押到国会纵火案侦察委员会的所在地德国国会。季米特洛夫在预审时宣布，他是保加利亚的政治侨民，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前议员和领导人。他表示，他不信任德国警察，因而未在向他提供的口供书上签字。

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向世界宣布：三名保共活动家以及纵火时被当场抓获的被称为共产党员的荷兰青年马里努斯·范·德·卢贝，还有1933年2月18日被捕的德共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托尔格列尔，是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策划者和执行者。

季米特洛夫开始并不相信，在这一反共勾当中，纳粹分子会把他同国会纵火案连在一起。然而，审问的全部进程、假证人的所谓“对质”以及宣称从他身上搜出的实际上是警察伪造的柏林地图等，已使人毫不怀疑，侦查的目的是要把他打成纵火犯。1933年3月20日，季米特洛夫交给警察当局一份文件，他在文件中声明，他作为共产党人，作为保共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家，根本不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实为反共的行为。他表明了自己的严正原则态度：焚烧国会和精神错乱的疯子的勾当。就在这份文件中，季

米特洛夫还为进行政治辩护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论点，同时指出，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并不在场——起火时他根本不在柏林。

当侦查结束后不久，1933年3月28日，三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被移禁于莫亚比特监狱。他们在这座监狱中也同前一座监狱中一样，受到了百般凌辱。季米特洛夫囊空如洗，也得不到报纸。寄给他的许多书信都到不了他手里，借口是这些书信是“查封的对象”。他坚决要求把没收的东西还给他，给他报纸和德文语法书，但冷酷的审判官沃格特总是回答“不行”。

从始到终，沃格特的审讯都是老一套。季米特洛夫坚决要求他提出具体明确的公诉，而沃格特却要他提供关于他在保共从事非法活动的情况，以及他同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联系。审讯时革命者季米特洛夫和反共分子、审判官沃格特这对不共戴天的敌人总是相互对峙。事情就这样拖到1933年6月1日预审结束为止。

法庭惊雷

1933年8月3日，季米特洛夫接到了长达235页打字纸的起诉书。他颇有兴趣地研究了德国司法机器的这一宏篇巨著，并且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加了许多评语。他在日记中写道：“空前的鬼域伎俩！”他在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搞清楚了要把这个文件严加保密的原因。起诉书拿不出任何材料来说明对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受到侦查的共产党活动家的控告是有根据的。事实上，公布起诉书就是对被告无罪的最好证明。

季米特洛夫深知，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借助法律的援助极

为重要。他和亲属们作了很大努力来寻找一个合适的辩护律师。不同国度的 25 名著名律师都同意替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同志们辩护，但帝国法院不允许他自由选择辩护人，所有被提出的律师都以某种借口遭到拒绝。后来，法庭指定德国律师特切尔博士为三个保加利亚人的官方辩护人，但季米特洛夫拒绝了当局给他指定的这个律师，毅然决定运用自己在狱中大量阅读法律方面的著作所获得的法律知识自行辩护，尽力准备以被告人兼辩护人的双重身份出庭。

国会纵火案被宣布为“范·德·卢贝及其同伙案”而交付帝国法庭第四庭审理，时间定于 1933 年 9 月 21 日。法西斯开动宣传机器、妄图使国际社会相信，德国法庭对本案的审理是“客观公正的”。但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未因此而受蒙蔽，因为他们目睹过纳粹党徒的恐怖，目睹过这些党徒疯狂地迫害犹太人、焚烧进步书籍的卑鄙行径。愤怒的浪潮席卷世界，站在这场斗争前列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发起并组织了反法西斯的声援活动。这场反法西斯斗争吸引了持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各阶层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反对挑衅性审判的信函和电报纷纷飞向德国各驻外使馆。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呼声响天，声援无辜的被告共产党人。

希特勒政府对审判则抱有奢望，它想通过审判来挽回面子，使自己不再受到“国会大厦起火是纳粹党徒所为”的指责。

审判于 1933 年 9 月 21 日在莱比锡第四刑庭正式开场，首次开庭的显著之点是法庭对审判的顺利进行信心十足。探照灯、扩音器、录音机等设备全都搬上法庭，它们要显示与共产主义拼个你死我活的决心。

头两天的诉讼程序进行得还“正常”。到了第三天，情势急转而下。9 月 23 日，法庭开始审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这一天

恰好是保加利亚 1923 年九月起义 10 周年，季米特洛夫以他惊人的力量向听众描述他领导过的革命斗争。他的话语犹如火热的召唤，也是对一切反共敌人的严重警告。

法庭庭长布恩格博士觉得，审讯的主动权已从他手中滑走了。显然，季米特洛夫已掌握了审讯的方向，这位卓越的革命者理直气壮地站在法西斯法庭上。审判的策划者本想加以扼杀的共产主义思想反而大大扩大了影响，而季米特洛夫本人也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一直很重视说明范·德·卢贝的作用。他接连向卢贝提了几个问题，以昭示卢贝在纵火时扮演的角色。季米特洛夫问道：“你为何犯下这种骇人听闻的反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罪行，又是谁同你一起干的？”布恩格博士连忙把问题岔开，法庭退庭合议。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季米特洛夫滥用权利并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不许他再提问题。

然而，季米特洛夫并没有丝毫让步。几天后，他再次要范·德·卢贝当众说明是否见过他，认识他？卢贝回答说，既未见过他，也不认识他。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此前范·德·卢贝连社会福利局的一间小木房都点不着，他何以能在坚实的国会大厦内燃起大火？卢贝无言以对。季米特洛夫斩钉截铁地说道：“共产国际要求彻底弄清国会起火的问题。千百万人等着回答！”布恩格博士急忙宣布休庭。

在此后的审理中，季米特洛夫又提出一系列问题来揭露先前侦查和预审是带倾向性的、蛮不讲理的。法庭成了激烈搏斗的舞台：庭长不时地打断季米特洛夫的发言，对他进行威胁；被告则对此置之不理，他依然证明，侦查员沃格特把未经司法机关批准的起诉书当作真凭实据加以扩散，是违反刑法的。双方相持不下，法庭只得退庭合议并提出警告：“如果被告季米特洛夫再要说

三道四，即将其押出法庭去。”

季米特洛夫接着陈述了一些新的事实，来彻底揭穿侦查时使用的一些伪造办法。有个女证人断言，她曾在1933年2月26日午后3时看见季米特洛夫和范·德·卢贝一同到了杜塞尔多夫大街的饭店里。当业已证明季米特洛夫这一天不在柏林时，这个已对当局无用的女人便无影无踪了。毫无疑问，假如那天季米特洛夫真的在柏林，那她的证明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审问了全部被告之后，审判的第一阶段即告结束。这一阶段共开庭十二次，但没有任何有力的材料能证明共产党人同国会纵火案有牵连。坚贞不渝的季米特洛夫撕下了公诉人的伪装，以确凿的证据驳斥了敌人提起公诉的图谋。

10月10日，审判在柏林的国会大厦内继续进行。被传唤来的几帮证人是：有关纵火本身的证人、有关被告同起火的关系的证人以及一些要驳斥国社党人参与纵火的说法的证人。这显然是一个以国社党党徒和刑事犯为多数的大杂烩。

还在第二次开庭时，季米特洛夫和庭长就由于程序问题发生了冲突。季米特洛夫要求提问，布恩格博士未予许可。于是季米特洛夫进而申明，他在审判中不只是被告，而且也是被告的辩护人。法庭采用了惯常的宗教裁判式措施——由于“一再拒绝”，季米特洛夫须三次不得出庭。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在走出法庭时辛辣的讽刺道：“审判的幕后策划者现在该心满意足了。”

不许出庭，季米特洛夫就用写抗议信的办法对法庭发起新的进攻。他于次日致函庭长：“把我摒斥于如此重要的各场开庭和审讯之外，实际上是公开剥夺了我的辩护权，这只能向全世界证明，我的公诉人自己感到对这个案件是没有太大把握的。这会打开许多不太注意世事的人们的眼界，给共产党的宣传提供新的材料。”在信末他写道：“假如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待遇还要继续下去，他

将考虑是否还有必要出庭。”

法庭在季米特洛夫缺席时听取了一些重要的证词，审问了三名鉴定人。他们否认了单独一人能焚烧国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准备纵火需要很长时间，是几个人合伙干的。鉴定人关于范·德·卢贝并非单枪匹马的意见是同季米特洛夫的看法吻合的。这也是他所能同意的起诉书的唯一一点，不过他清楚地指出，应当在“工人阶级的敌人”中寻找范·德·卢贝的同谋。季米特洛夫根据专家和鉴定人确认的这些事实，发展了自己关于国会纵火案的基本观点，为此而使用了歌德经典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他指出：“……譬如说，在这场审判中，范·德·卢贝只不过是国会纵火案中的浮士德而已；无疑地，站在他背后的还有靡非斯特。可怜的浮士德被送交帝国法庭，而靡非斯特已逃之夭夭。作为一个偶然的和无辜的被告，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对于立即彻底查清国会纵火案，同时把销声匿迹的‘靡非斯特’提拿归案，是很感兴趣的。”

1933年11月3日再次开庭时，季米特洛夫由于同检察长维尔纳博士发生争执而再度被隔离于法庭之外，这次历时三天。

三天不准出庭，趁机“休息”三天。季米特洛夫在抛出“魔鬼之圈”，套住了一百多个“证人”后，如释重负。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被遣离法庭，并不是因为他屡犯“禁令”，更不是法西斯分子招数告罄，赐给他几天安静。不，正当他用“魔鬼之圈”为此前的审讯打了一个大句号时，“靡非斯特”的一个阴谋又趋成熟，要使他猝不及防地遭到所谓“重型炮弹”的轰击。11月4日，当从监狱被押到法庭，坐在被告席上时，他才发现证人席上坐着一个“大人物”。

他眼前的对手是国会议长、普鲁士总理兼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

这是一个他渴望与之交锋而又心中无数的家伙。这家伙傲慢、粗暴、残忍、无情。他曾经使用中世纪的酷刑处决犯人，命令刽子手劈开犯人的胸膛，使受刑者在生命的最后一瞬能看见明晃晃的斧头。

今天，审判大厅里的格局也非同往常。特设的旁听席上坐着盖世太保的头子迪尔斯和柏林警察总监冯·列维卓夫，还有包括美国驻柏林大使多特在内的各国外交官。苏联记者也自开庭以来第一次被允许旁听。身材魁梧的普鲁士总理穿着冲锋队的制服，身后跟着几名威武的年轻空军军官。他目空一切地昂着脑袋，在照相机的“咔嚓”声和电影机的“沙沙”声中步向话筒，在坐的人们都把惊讶的目光倾注到了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身上。

莫非戈林对自己的胜利有把握？他能拿出什么货色？季米特洛夫急速调动全部脑细胞，紧张地思考着对付的办法。

10时13分，庭长宾格尔博士宣布开庭——首先请戈林作证。普鲁士总理骄矜地横扫众人一眼，周身透出蛮横之气。

“诸位法官先生，最高检察长先生，本人今天以双重身份出庭作证。第一，我是起火现场的重要目击者，略知当时的情景；第二，我是国会议长，不能对我有权保护的国会大厦漠然处之。但是，我要强调指出，奇怪的是，竟然有人断言我的朋友戈培尔先生制定了焚烧国会的计划，而我，一个国会议长，又心甘情愿执行了这个计划。这是无耻的诽谤，诸位先生，我要强调指出，这是无耻的诽谤！世间有放火烧自家房子的蠢货吗？嗯？……”

戈林两手插在裤兜里，得意地摇晃着脑袋，他象着了魔似的，提高了嗓门说道：

“据说什么德国法西斯受害者国际救援委员会出版了《揭穿国会纵火案真相和希特勒恐怖褐皮书》，还有所谓国际调查委员会在伦敦搞了什么审判材料，这些东西我有幸看到了。可以断定，无

耻的诽谤就是从那里贩卖来的。那个奇怪的审讯都网罗了一些什么样的证人呢？嗯？当然是一些赤色分子，一些刽子手。诸位先生，我要强调指出，是一些刽子手！”

宾格尔博士听到这儿，觉得不是滋味，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天的审判大厅里显示了法庭的公允：“戈林先生，恕我问一句，您刚才使用了‘刽子手’一词吧？”

普鲁士总理不屑一顾，神气地回答说：“当然，我指的是那些假证人，还有一些外国报刊。我为什么要烧毁国会大厦，以此反对共产党人呢？用不着！我反对共产党人是天经地义。1月30日，元首委任我当内务部长，我的使命就是使用一切手段连根铲除共产主义！……”

季米特洛夫慢慢平静下来。戈林才讲了半个小时，他就在白纸上评判道：急躁、蠢笨、色厉内荏。但他仍用心听着、记着，准备给这只凶残的野兽以迎头痛击。

“国会大厦一起火，我就预感到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当有人报告我说托格勒和凯纳在起火前离开大厦时，我心里完全有了把握，当即下令逮捕犯罪分子、狡猾的共产党人。不管这一审判如何结束，我都会找到罪犯，向他们追究责任。诸位先生，我要强调指出，向他们追究责任！……”

与其他证人相比，戈林是幸运的，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未被被告打断。但是，在法庭稍作休息之后，季米特洛夫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

宾格尔博士假惺惺地问道：“你还有什么问题，季米特洛夫？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季米特洛夫胸有成竹地回答，“我还有好些问题，开头先提几个小问题！……勃兰登堡地区冲锋队负责人海尔道夫曾向法庭供认，他在2月27日11点或者12点半光景，自动发布了一

个指示，要求立刻逮捕在柏林的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我想知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

戈林似乎已把他2月27日一整天的活动忘得一干二净，随口答道：“海尔多夫一听说发生火警，他也同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马上明白了这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因此，他就对自己的亲信作了这样的指示。”

季米特洛夫如此这般地用几个“小问题”使戈林撒了一通谎后，突然一侧身，逼视着证人冷厉的脸，把话锋一转：“记得总理先生说过，要是您的警察开枪射击，就等于是您开枪射击。那么试问，要是您的警察撒谎，那等于谁在撒谎？”

戈林的眼睛闪射着两道凶光：“季米特洛夫，我知道你很狡猾，因此，我要强调指出，我的警察不会撒谎。”

“但是，总有人撒了谎。”

“是指我吗？”戈林脑袋一歪，问道。

“当然不是，总理先生，”季米特洛夫停顿了一下，又说，“总理先生在国会大厦起火的第二天曾经断言，范·德·卢贝被捕时，在他身上搜出的不仅有他的护照，而且还有他的党证。请问总理先生，您当时是从哪里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是警察向您报告的吗？”

戈林漫不经心地说道：“我要强调指出，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案子并不太感兴趣，就是说，我还没有读完所有的报告。但我有时发现，你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因此，老实说，我猜想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你早就搞清楚了。”

“对，确实如此。我想告诉总理先生，当时抓住范·德·卢贝并且审问他的那三个警察，在法庭上异口同声地证实，他们没有在卢贝身上发现什么党证。我想知道，戈林先生的报告里为什么要那样讲？”